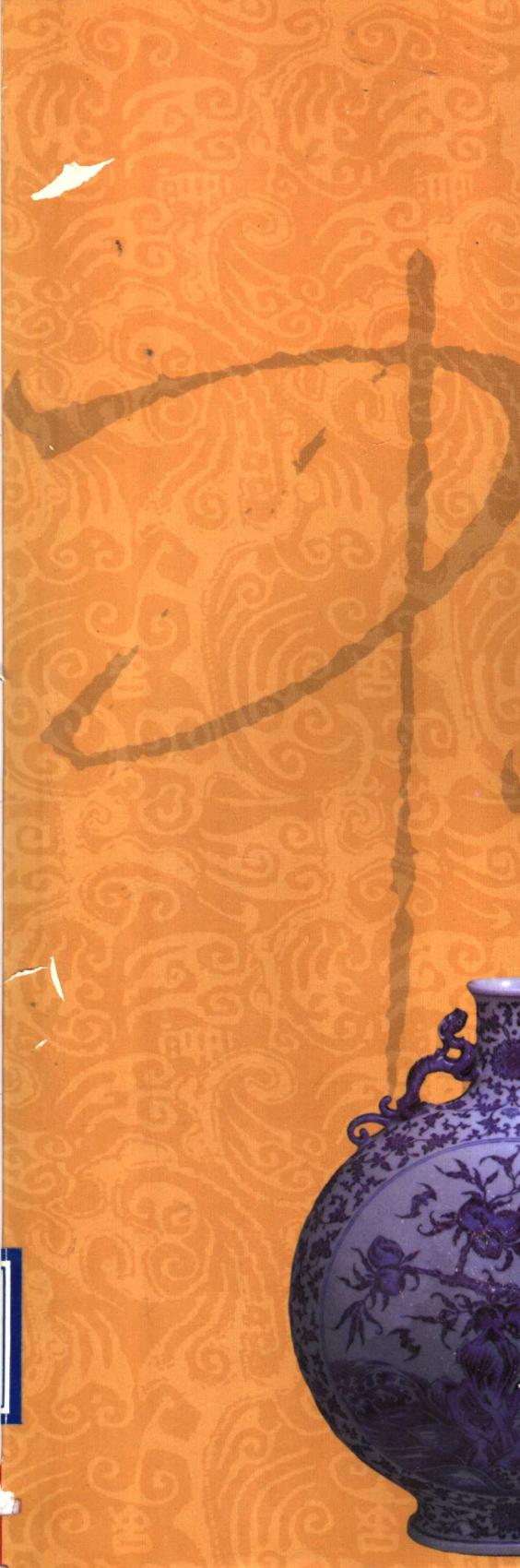


中华文明之光

袁行霈 主编
【下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明之光

袁行霈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之光/袁行霈主编.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301-07556-1

I . 中… II . 袁… III . 文化史—中国—古代 IV .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1472 号

书 名：中华文明之光(上、下卷)

著作责任者：袁行霈 主编

责任编辑：乔 默

标准书号：ISBN 7-301-07556-1/G·125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 pup@ pup.pku.edu.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90.5 印张 154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二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宋太祖赵匡胤	邓小平(1)
历史上的包公	张希清(10)
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陈少峰(26)
欧阳修	马秀娟(32)
宋代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邓广铭(45)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王锦贵(53)
苏轼	钱志熙(71)
岳飞	邓小平(79)
李清照	程郁缀(95)
辛弃疾和他的词	张 鸣(105)
亘古男儿一放翁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生平及其诗歌	张 鸣(122)
朱熹	陈 来(141)
文天祥与《正气歌》	程郁缀(145)
宋词艺术	周先慎(154)
宋代的说话艺术	陈曦钟(176)
宋代书院	陈少峰(186)
科举	张希清(191)
沈括与《梦溪笔谈》	西门纪业(204)
中国的印刷术	白化文(214)
宋元善本	张玉范(228)
宋元绘画	王岳川(237)
宋元瓷器	李民举(248)
中国文化在印度	季羡林(257)
八仙	李鼎霞 白化文(265)

八仙	王宗昱(278)
《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元代中国	余大钧(283)
关汉卿与元杂剧	冯钟芸 周兆新(296)
王实甫的《西厢记》	李 简(301)
元散曲	李 简(309)
《三国演义》	周兆新(318)
《水浒传》	吕乃岩(328)
中国古代货币的历史	吴荣曾(345)
中国古钟	王大钧(351)
郑和下西洋	何芳川(359)
明陵建筑与文物	张仁忠(366)
漫话《西游记》	刘勇强(376)
汤显祖与《牡丹亭》	杨 忠(387)
王阳明	陈 来(398)
戚继光	耿引曾(404)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姚伯岳(410)
徐霞客	谢凝高(420)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	韩光辉(433)
官私藏书楼	郑如斯 肖东发(444)
中国地方志	朱天俊(459)
郑成功	张仁忠(474)
明清北京城	侯仁之(484)
明清园林艺术	何绿萍(496)
明清绘画	叶 朗 白 巍(509)
明清国子监	师曾志(514)
故宫建筑美的时代特征	杨 辛(525)
天坛	杨 辛(538)
避暑山庄	王天有 李孝聪(543)
“康乾盛世”	张仁忠(551)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周先慎(568)
讽刺小说杰作《儒林外史》	马振方(589)
漫谈《红楼梦》	沈天佑(600)
侠与武侠小说	张 英(611)

印文化与文人印	王岳川(623)
昆曲的兴衰和艺术特色	林 煦(633)
集传统戏剧大成的京剧	林 煦(641)
清代曲艺	汪景寿(650)
中国文化在日本	严绍璗(659)
中国文化在18世纪的法国	孟 华(675)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	李明滨(687)
林则徐	王晓秋(698)
龚自珍	孙钦善(707)
黄遵宪	王晓秋(724)
戊戌变法	郭卫东(731)
圆明园	林华国(740)
民居与四合院	韩茂莉(747)
春节民俗	陈连山(753)
京师大学堂	郭建荣(761)
秋瑾	夏晓虹(770)
孙中山	张寄谦(778)
五四新文化运动	严家炎(790)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吴同瑞(801)

宋太祖赵匡胤

邓小南

讲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们经常将唐宗宋祖相提并论。这里所说的“唐宗”，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宋祖，则是指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是北宋王朝的开国皇帝。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唐末五代，长期持续着动乱局面。公元 960 年，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此后，成功地巩固了统治，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并且使国内的局势逐步安定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赵匡胤是惟一职业军人出身的开国皇帝；而他所创立的宋王朝，却是一个以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著称的国家。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官僚政治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与数百年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媲美。

20 世纪初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严复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之面貌，无论是好是坏，什之八九为宋代造成。40 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成就登峰造极的时期。近年来，许多海外汉学家也指出，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宋朝开国阶段的政策趋向是分不开的。要真正认识这样一个蓬勃发展、充满变革的时代，不能不从宋王朝的缔造者讲起。

赵匡胤的青年时代

公元 10 世纪初，唐王朝的统治在激剧的武装冲突中结束；从 907 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所谓“五代”，是指在中原地区前后相继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时代；“十国”则是指在南方以及今天山西

境内先后存在过的十个大小不等割据分立的政权。当时，仅中原地区即有八个姓氏称帝，五十余年间，出现了十四个君主。各个政权内部，兄弟厮杀，父子反目，禁军统帅篡权，下层士兵哗变，这类事例数不胜数。地方上掌握重权的节度使们，很少把朝廷放在眼里，他们毫不掩饰地说：“天子宁有种乎？马壮兵强者为之尔！”

公元 927 年，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他的父亲赵弘殷，是后唐的一位中层军官。赵匡胤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成长起来，身边发生的一切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赵匡胤还不到 10 岁时，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为实现自己作皇帝的愿望，以割地、称臣、称儿为条件，借助契丹势力，建立了后晋；他将幽州（今北京一带）、蓟州（今河北蓟县）等十六个州，也就是宋人所说的“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此后，中原王朝即失去了北面防守的天然屏障，民族矛盾趋于复杂化。

少年时期的赵匡胤，英俊魁梧，善于骑射。有一次，在试骑一匹烈马时，他不用缰绳衔勒，刚跨上马背，马突然直奔城门斜坡，赵匡胤前额撞在城楼门楣上，跌倒在地。围观的人们都以为出了大事，没想到赵匡胤自尘埃中一跃而起，追奔向前，终于制伏了烈马。

20 岁以后的赵匡胤，不满于中原地区连续不断的动乱，怀着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独自外出闯荡天下，尝遍了颠沛流离之苦，后来投奔在后汉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郭威麾下。不久，郭威通过兵变建立后周政权，作了皇帝，赵匡胤由于拥立有功，得到了提升。郭威养子柴荣（也就是周世宗）继承帝位后，赵匡胤成为禁军将官之一。

周世宗在位期间，继承前代努力，对于军事、政治、经济进行整顿。当时，赵匡胤治军恩威并济，纪律严明，在抵御北汉、征讨南唐的多次战役中屡立功劳。他的军事才能受到对峙方面的一致称赞。南唐国主李璟曾经派遣使者馈赠赵匡胤白金三千两，他却全部输纳给朝廷府库。这种廉洁自律的操守，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出征淮南时，有人到世宗处报告说，赵匡胤的随行物品中，有几车重货；世宗派人去查看，没见到任何金银财宝，只找到几千卷书籍。赵匡胤这种喜爱读书、“广见闻”、“增智虑”的习惯，一直保持终生。

959 年，周世宗试图统一北方，亲自率军北伐；不料途中疾病发作，匆匆返回京城开封。为安排后事，世宗将他认为没有野心、值得信赖的赵匡胤提拔为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世宗很快去世，他 7 岁的儿子

柴宗训继承了帝位，赵匡胤仍然在朝廷率领禁军。此时的后周，“主少国疑”，原本相对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莫测了。

这个时候的赵匡胤，羽翼丰实，早把禁军中的一班将领团结在自己身边。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知兵善战者结为“义社十兄弟”，培植起个人势力。在他的谋士班子中，弟弟赵匡义、幕僚赵普、李处耘等，个个不甘寂寞，一项密谋在暗中酝酿起来。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公元 960 年正月初一，河北传来契丹与北汉军队联合南下进攻的消息。当时，年幼的皇帝事实上无法主持政务，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掌握在宰相范质、王溥等人手中。首相范质循规蹈矩、稳重端方，却难以担当砥定狂澜的重任。仓促间，他们决定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北上应战。

对于这次所谓“契丹、北汉的联合入侵”，记录契丹史实的《辽史》中没有记载；记录宋代史实的书籍中，也大多只提及“入侵”的消息，而未讲到事态的发展。实际上，所谓“入侵”，很可能是地方上送来的谎报，是赵匡胤集团实现其阴谋的一个步骤。在当时情况下，假借面临入侵的威胁，以民族利益保卫者的面目登场，便于赢得民众支持，以举足轻重的姿态出现于政治舞台；而且，利用北伐名义集结军队，离开首都开封，有利于避开中央朝廷的直接控制，便于展开预定计划。这实际上也是后周创立者郭威组织兵变、建立政权的故智重演。

正月初三，大军自开封出发，在赵匡胤的严格约束下，部队纪律严明。京城浮动不安的人心，稍稍安定下来。

当晚，军队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宿营。参与兵变预谋的赵普、赵匡义等人四下活动。将士们纷纷聚议，有人说：“当今主上幼弱，不能亲政，我们出死力为国家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点检作天子，然后北上也不迟。”赵普等人部署停当，连夜派人飞骑进京，与戍守京城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约定内外策应。

第二天凌晨，陈桥驿一带鼓噪叫呼声连成一片，将校们手持兵器，要求“策太尉（指赵匡胤）为天子”。不等赵匡胤答话，军士们就把象征帝王朝服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众人高呼“万岁”，将他拥到马上，准备返回开封。

此时的赵匡胤，表面上酣睡方醒，心中却非常清楚。他明白，生死成败在此一举，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拿下京城并且迅速稳定局势。他勒住马缰，与将士们约法三章：不得惊扰后周的少帝与太后，不得凌辱公卿大臣，不得掳掠朝廷府库和百姓之家。遵命者重赏，违令者诛杀。

将士们表示听命，大军即刻返回京城。刚刚得到消息的宰相们，还没来得及组织抵抗，兵变的军队已经开进了宫城。当天下午，赵匡胤就以“受禅”的名义，即了帝位。因为他曾经是归德军节度使，而该节度的治所在宋州（今商丘），所以新王朝称作“宋朝”。

赵匡胤的主要历史贡献

赵匡胤作皇帝十六年，史称“宋太祖”。在位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宋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确定了“先南后北”战略，推进了统一事业

长期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的赵匡胤，登上帝位后，决心继续推进统一大业。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和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赵匡胤在平定了节度使李筠、李重进的反叛之后，心中念念不忘的，是统一的战略部署。

一天晚上，天正下着大雪，赵匡胤和二弟光义（即匡义）突然来到赵普家中。赵普惊讶地试探皇帝的来意，小心地问道：“夜深了，天又这么冷，陛下为什么还出来呢？”太祖回答说：“床榻之外都是别人的天地，我实在难以入睡。”他们讨论了当时北方辽朝兵力强盛、南方割据小国经济富庶而兵力疲弱的局面，讨论了用兵步骤的各种可能性，决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这就是有名的“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事实证明，这一决策，不仅是避实就虚、避免双线作战的军事战略，同时也是基于对客观情势清醒认识之上的政治战略，是有利于战时国家财政及战后经济复苏的整体战略。

宋太祖在南进过程中，继平定了荆湖、西蜀、南汉之后，消灭的最后一处割据政权，是地处江南的南唐。当时的南唐国主李煜，也就是“李后主”，是个“美秀多文”的才子，生活上却痴迷声色，政治上更庸懦无

能。赵匡胤为实现“天下一家”的目标，派人在长江江面狭窄处架设浮桥，由曹彬等率兵南下，顺利攻取了南唐。

此时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而正确的战略部署，也促成了统一的顺利实现。赵匡胤本人，原是行伍出身，指挥作战的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善于用人。他对于进取南方的战略部署，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由于他出身微贱，也体会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历次战役开始前，他总是把“慎勿杀戮”、“勿害良民”作为主要的训戒。进攻南唐的大军临行时，宋太祖对主将曹彬主要的指示是“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烦急击”。对于投降的割据政权君主，他采取了比较宽大的政策。

宋太祖处理对辽关系的原则是要收回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他在首都开封设立了专项府库，收藏金帛，准备用以赎买十六州之地。他在位期间，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于占领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拓跋氏，他也基本上持优容态度。

“先南后北”战略的实施以及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使得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家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

（二）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分裂隐患

赵匡胤作皇帝后，最为担心的，是怕自己建立的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他曾经问赵普，“自从唐朝灭亡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斗不止，百姓涂炭，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为国家作长久打算，应该怎么办？”赵普回答说：“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是藩镇节度使的权势太重，君弱臣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夺取藩镇权力，控制财政权，收夺地方上的精兵，使他们难与中央抗衡，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下来。”这番话，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这一策略，此后即成为北宋集中政权、财权、兵权的行动纲领。

赵匡胤本人曾经参加过拥立后周皇帝郭威的兵变，他自己统领禁军后，又通过“陈桥兵变”作了皇帝。根据自身经验，他对于身边的禁军统帅，有着极高的警惕。当时，禁军的高级将领，有的是他往日的密友，有的直接参加了拥立他的预谋；这些人自恃有功，已经开始偃蹇跋扈。种种现实，促使赵匡胤下决心解决禁军的领导权问题。传说中“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据说建隆二年（961）秋天的一个晚上，宋太祖在宫中设酒宴款待石

石守信等禁军将领。饮至酒酣耳热之际,他对这些老朋友说:“作天子真是太艰难了,真还不如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追问原因,赵匡胤说:“这很容易知道,我今天这个位子,谁不想坐?”众将领赶紧表示,“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怎奈你们的部下,可能会有贪图富贵的人,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能怎么办!”诸将一听,只得请求皇帝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去,买些上好田宅,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快快乐乐度过一生。我的子女与你们的后代约为婚姻,君臣之间永无猜疑,岂不很好?”众将无可奈何,只得表示感谢。第二天,这些高级将领,纷纷要求罢免军权。宋太祖公开对他们加以抚慰,给予他们优厚的经济待遇。

历史上并不一定真有这件事情;收回禁军大将掌握的兵权,也不是通过一两次酒宴所能完成的。但是,建隆二年以后,禁军的领导权不再把持在赵匡胤这些“义社兄弟”手中,则是确实无疑的。禁军的领导权有了重大的调整:领兵权分散到三个部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军官分别被提拔到领导职位上;而全国军队的调动权则掌握在枢密院。调兵权与领兵权一分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对于戍守边境的将领,宋太祖采用的方针是选择能力较强而官位不高的武将,对他们予以信任,给他们优厚待遇,让他们长期戍卫一方。以前藩镇截留的财物,则一律收归中央调拨。

北宋初年,对于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也进行了一番更革。为防止君弱臣强局面的再现,宋太祖采取分掌事权、相互维系的办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当时,以宰相掌行政权,枢密使掌军事调拨权,三司使掌财政权;大致上形成了一种“三权鼎立”的格局。职能分工的明确,加以太祖“不事虚文”的作风,使得当时行政效率比较高;而官僚权力的分散,又使皇帝得以实行集权。

与此同时,宋王朝派文臣出任地方长官,并且建立了长官之间相互监督、三年易任的制度,以防止地方行政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北宋的统一,从其覆盖面来看,并不彻底。但是,北宋初期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并且进而消除了内部分裂的危机。随着生产的稳定发展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增强,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公开的地方割据局势出现,这无疑体现着时代的进步。

(三) 建法立制,发展经济文化

唐代后期以来,封建国家的法制受到极大破坏,统治者经常滥用刑罚。宋王朝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使天下断案有统一的法典可供依据。宋人曾经说,当时的立法原则是“宽缘坐而严故入”,也就是说,对于受到他人牵连的人处理可以放宽;而对知法犯法者的处理则要从严。

宋太祖通常宽待臣下,而对于贪官污吏则严惩不贷。他看到五代时贪赃枉法现象严重,决心拨乱反正。曾经有学者把太祖时期因为贪污被处死的官员作了一个统计,仅在史籍中有名可考的,即有 28 人。即便是太祖长期信赖的臂膀赵普,也因为贪赃专权而被免去了宰相职务。

当然,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宋初惩治贪污的决心和成果。太祖对其臣下所要求的,首先是忠实而不是清廉。他本人劝石守信等人“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实际上就是以优厚的经济待遇和一定程度上的放纵,换取他们对于宋朝政权的支持。

宋初的最高统治集团,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自从政权建立之后,就着手革除五代以来的横征暴敛。同时逐步减轻徭役,组织兴修水利,垦荒植树,采取了种种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措施。随着国家的统一,颁布了相对划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改善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道网,并且减轻了商税,从而为国内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选拔合格的官员,宋太祖继续实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且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考试,此后殿试成为制度,科举合格的人对于皇帝感恩戴德,被称作“天子门生”。此外,对于官员的任命、考核、赏罚等等,都有了明确的法规。宋初强化了监察制度,提倡士大夫们学法执法;到宋神宗时期,通过各种途径做官的人,都要参加有关法律知识的考试。

宋太祖曾经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他自己喜欢读书,也经常向周围的文人们请教。据说卢多逊在作翰林学士时,经常打听太祖近日在读些什么书,当皇帝召他询问时,他总能对答如流,因而受到了器重。

赵匡胤做皇帝后,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回答说:“道理最大。”太祖十分赞同。依“道理”办事,正是北宋初期政治突出的特点之一。宋人曾经传说,在开封的太庙中,藏有宋太祖所立誓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是,不杀言事者。不论是否真有其事,宋初统治者鼓

励官员提出意见、建议,宽容言事者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对于宋代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非常突出的意义。

节俭率直的作风

北宋政权初建,国家百废待兴。为节省开支,赵匡胤力倡节俭。据说当时宫殿中垂挂的帘帐,都只用青布装饰;皇帝穿的御衣,只有赭袍用绫罗制作,其余都用较次的衣料。皇后和公主曾经建议用黄金装饰皇帝的轿子,赵匡胤断然拒绝。有一次宫廷宴会时,弟弟光义劝他,既然身为帝王,不宜过于草率。赵匡胤严肃地回答说:“难道你忘记我们住在夹马营的时候了?”太祖的女儿永庆公主穿过一件贴有翠鸟羽毛的绣花短衫,赵匡胤一见,就不高兴地说:“以后不许再穿这种衣服。这样华丽的服饰,不知有多少人会仿效。你生长富贵,不该再带头做这种事情。”

对于他人的奢侈生活,赵匡胤也极为厌恶。后蜀的亡国君主孟昶,用金银宝石装饰溺器(也就是便盆),赵匡胤一见大怒,痛斥他说:“你用珍宝装饰溺器,用什么来装食物?像你这样的君主,怎么会不亡国!”

上行下效。当时,出现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普通官员上任,有时会穿着草鞋,拄着手杖,徒步而行。一些高级官员,也不肯乘坐用人抬的轿子。

赵匡胤为人比较直率,胸襟也较为坦荡。他作皇帝以后,对于一些过去有过嫌隙的人,通常采取不咎既往的态度。据说赵普曾经开列过一份名单,把以往结下仇怨的人,一一列在上面,要求赵匡胤伺机处分。赵匡胤却说,“若尘埃中总教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去寻也”。意思是说,人们不可能事先识别出未来的天子、宰相,你这样做,岂不会乱了天下。

公元 976 年 10 月,不满 50 岁的赵匡胤突然死于宫中。关于他的死因,有所谓“斧声烛影”的传说,号称为“千古之谜”。16 年前,他靠政治阴谋夺取了统治权;16 年后,他的帝位又被另一场政治阴谋所夺得。这一阴谋直接出自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其策划者,正是赵匡胤的亲弟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在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有这样两句话:“先皇帝创业十有六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他即位后,基本上继承了赵匡胤在位时的各项政策。

应该说,赵匡胤在位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赵匡胤自军人出身,深知战争的残酷,因而注重以非流血的手段去处理内外冲突;他出身低微,深受动乱之苦,所以致力于发展生产,创造和平环境;他自身文化修养不高,却注重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以分化事权的办法成功解决了大臣、武夫专权的问题,但是由此带来的官僚机构重叠、事权不清又成为宋代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在饥荒地区召流民为兵,有效地防止了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发生,但养兵政策给北宋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他强调“强干弱枝”,却过分削弱了地方实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范内患,“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使得宋代政治出现了消极保守的倾向。但是,他所奠定的相对开放宽松的政治基调,对于北宋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参考书目

- ① 张家驹《赵匡胤传》。
- ②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论赵匡胤》。
-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宋金史分册》。

历史上的包公

张希清

提起“包公”，不但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而且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知道者也很多。不过，大家所知道的“包公”，大多是戏剧舞台上或电影、电视屏幕上的“黑脸包青天”。他头戴乌纱帽，身穿衮龙袍，打坐开封府，怒铡陈世美，是一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为民做主、除暴安良的“清官”。这个戏剧舞台或影视屏幕上的包公，当然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是，同历史上的包公即宋代的包拯相比，又有相当大的区别，因为他毕竟是人们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其中加进了人民群众和艺术家们的想象。那么，历史上的包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被誉为“清官”的典范而备受人们称赞和敬仰？下边，我们就谈一谈历史上的包公。

一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包公有不少记载。现存的有宋朝人撰写的《两朝国史·包拯传》，元朝人撰写的《宋史·包拯传》，包公的门人张田编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以及南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等等；1973年，在合肥市东郊又出土了包公及其家族的六方墓志铭，为研究包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谈历史上的包公，主要是根据这些史料，而不是根据《铡美案》、《包龙图公案》、《三侠五义》一类的戏剧、小说。

历史上的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出生于庐州合肥县，就是现在的合肥市肥东县包村；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五月，死于东京开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

封市,终年 64 岁。次年葬于庐州合肥公城乡公城里,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市东郊大兴集乡双圩村。现在的包公墓则是 1987 年改葬重新修建的。

包拯自称“生于草茅”,史书记载,他的父亲叫包令仪,曾做过福建惠安县知县,官阶至虞部员外郎。看来,他只是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而非高官显宦之家。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仰慕古代圣贤所为,有“竭忠死义”之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 29 岁,一举考中第一甲进士,授官为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今江西南城)。宋代科举进士一般分五甲即五等,天圣五年王尧臣榜,共取进士 377 人,其中第一甲为 30 人。包拯高中一甲进士,授官知县,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不但可以借此登上政治舞台,而且预示在仕途上有着光明的前景。当时,包公的父母年事已高,均在家居住,不愿远离家乡。包拯为了照顾父母,放弃建昌县知县的官职而改任职位较低的监和州税。和州(今安徽和县)虽邻近合肥,父母仍不愿意随同前往,而让包拯一人前去上任。是上任为国尽忠,还是在家为父母尽孝?使包拯进退两难。将近而立之年的包拯,是多么渴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呀,但是经过比较,他还是毅然辞去官职,屏居乡里,奉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守丧三年期满之后,已经 39 岁的包拯才重登仕途,出仕做官。史书记载,包拯为了侍奉年迈的双亲,居家长达十年之久,不去做官,真可以说是“至孝”。由此足以证明,包拯绝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人,而是一个淡泊名利、品德高尚的人。

在这十年之间,包拯都做了些什么呢?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他重登仕途时的一首明志诗中可以看出,他在居家尽孝的同时,仍然在做修身的功夫,即继续研读经史之书,培养高尚的情操,探求治国安民之道,为重新出仕之后报国尽忠做准备。其诗云: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遗来者羞。

这首诗的大意是:居心清正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正道直行是做人的准则。秀美的树干终将成为栋梁之材,精纯的钢铁决不应该作成弯钩。仓库充盈老鼠麻雀也会欢喜,地光草尽狐狸兔子都要发愁。史书上记载着历代先贤的遗训,从政做官不要留下劣迹招致后人的羞辱。诗言